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董方奎 编著

辛亥百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董方奎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董方奎 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359-4

I. ①梁… II. ①董…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人物研究
②护国运动—史料 IV. ①B259.1 ②K258.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7502 号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编著:董方奎 ©

责任编辑:肖颖

责任校对:易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定价:5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民主宪政的追求者	(1)
一、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1)
仁矣哉破坏	(1)
与革命党舌战	(4)
请愿失败	(5)
二、拥护共和	(7)
政变计划破产	(7)
抛弃虚君共和	(9)
拥护民主共和	(12)
三、投奔袁世凯	(13)
弃嫌相携	(13)
筹组大党	(15)
攻击“二次革命”	(18)
四、“人才内阁”的下场	(20)
妄图左右天下	(20)
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	(21)
在退让中被踢开	(22)
进步党遭镇压	(24)
五、宪政破产	(25)
矢志追求宪政	(25)
希望再次破灭	(28)

第二章 揭开反帝制序幕	(30)
一、反对“二十一条”	(30)
政治质问案	(30)
痛斥日本侵略谬论	(3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6)
二、丑剧不能同演	(38)
失望与检讨	(38)
丑剧难于同演	(40)
复古思潮评议	(42)
三、丑剧公演以后	(44)
帝制筹安与登场	(44)
揭开反帝制序幕	(47)
四、海外的号角	(51)
孙中山讨袁	(51)
黄兴与孙中山携手	(56)
讨袁联合战线形成	(57)
第三章 咨受大计 部署略定	(59)
一、蔡锷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59)
师生之间	(59)
受骗入京	(61)
“忠于”职守	(62)
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63)
二、策划西南发难	(65)
秘密策划	(65)
巧计脱逃	(68)
一去不返	(70)
第四章 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	(72)
一、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72)
动员起来	(72)
联合发动	(74)
唐继尧的矛盾	(76)
李、蔡入滇	(80)
组织起来	(83)

二、通电宣誓讨袁	(87)
警告与最后通牒	(87)
檄告全国	(91)
对外方针	(92)
军师的运筹	(94)
盛大的节日	(101)
第五章 指陈方略 川湘告捷	(107)
一、蔡锷进军泸州、纳溪	(107)
首取叙府	(107)
刘存厚响应及占领纳溪	(109)
二、贵州独立	(111)
三、泸纳血战	(113)
袁世凯的妄想及北洋军之残暴	(113)
反围攻叙府鏖战	(115)
泸纳血战总攻受挫	(117)
湘西及川东战场	(120)
蜀道崎岖	(121)
指陈方略，反攻获捷	(124)
四、叙泸停战	(128)
冯玉祥倒戈	(128)
泸纳停战	(131)
第六章 从军广西	(134)
一、偷渡入桂	(134)
策动陆荣廷	(134)
离沪赴港	(137)
蛰伏横滨丸	(140)
在军中敬告国人	(141)
偷渡入桂	(143)
二、歼灭龙觐光犯滇军	(144)
龙觐光犯滇	(144)
剥隘、百色之捷	(146)
三、广西独立	(148)
四、帝制丑剧收场	(150)

丑剧收场·····	(150)
民意耶？帝意耶？·····	(153)
第七章 迫龙独立 ·····	(157)
一、中华革命军兵临城下·····	(157)
龙济光及“济军”·····	(157)
在港澳的策动·····	(158)
朱执信讨袁·····	(160)
陈炯明攻惠州·····	(161)
民军蜂起·····	(163)
兵临城下·····	(164)
二、留龙与逐龙之争·····	(167)
停战待议·····	(167)
海珠惨案·····	(169)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	(170)
留龙与逐龙之争·····	(172)
第八章 逼袁退位 ·····	(176)
一、坚持逼袁退位的方针·····	(176)
舍袁退位外无调停余地·····	(176)
袁世凯之解剖·····	(180)
和平保障惟恃武力·····	(182)
二、军务院成立·····	(183)
筹组军务院·····	(183)
对袁世凯之宣判·····	(185)
斥筹安新派·····	(186)
三、争取冯国璋，促段反袁·····	(188)
争取冯国璋·····	(188)
冯国璋之“调停”·····	(191)
促段反袁·····	(192)
南京会议·····	(195)
离粤返沪·····	(198)
四、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气急暴死·····	(200)
浙、陕独立·····	(200)
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及中华革命军之进攻·····	(203)

黄兴及海外华侨讨袁之声·····	(206)
促陈叛袁，逼汤独立·····	(209)
第九章 民国安在 ·····	(213)
一、胜利与妥协·····	(213)
坚持恢复《临时约法》·····	(213)
惩凶及对段祺瑞妥协·····	(216)
撤废军务院及中华革命军改编·····	(219)
善后·····	(224)
二、护国战争与梁启超·····	(229)
三、民国安在·····	(233)
附录1 护国战争大事日志 ·····	(237)
附录2 人物注释索引（按姓氏笔画排序） ·····	(284)
后 记 ·····	(289)

第一章 民主宪政的追求者

一、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仁矣哉破坏

戊戌维新时期的政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启超^①以变法图强、追求君主立宪而闻名中外。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可是他追求立宪政治的理想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来愈坚决。

实现立宪政体，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共同要求。但是如何实现立宪政体呢？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封建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摸索实现立宪政体的过程中，却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②等人的协助下，力谋与康、梁合作，“共同实行革

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现属广东省江门市。少有神童之称，十二岁考取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次年拜康有为为师，协助其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深受其影响。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8月参加强学会，任书记员，旋任上海《时事报》总编辑、长沙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1898年春入京参加变法。

② 宫崎寅藏（1871—1922），又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也作宫崎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清末结识孙中山，为兴中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而奔走。1900年参加惠州之役，失败后回国。1904年结识黄兴，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沪上评论》，并参与策划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

命大业”，但遭到康有为^①的断然拒绝。1899年3月，康离日本去加拿大后，孙中山、陈少白等继续争取梁启超。梁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中体会到不破坏旧势力就不能使历史求得进步，夏秋之间，“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孙中山“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旅日康徒半赞成之。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②。

孙、梁联合达成初步协议后，由梁启超草拟致康有为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革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将继续往开来，以报恩师”。由梁启超、韩文举^③、欧榘甲^④等重要弟子十三人签名^⑤，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长期休养。同时，梁启超还发表《国权与民权》、《祈死战》、《中国魂安在》、《破坏主义》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追求民权政治。他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也”，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因为保守势力的“恋旧”，“实阻碍进步之一大根源也”，“使之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盖其可畏可恨至于如此”，必须用“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的办法，“使千百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

①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今文学学家。1879年游香港，注意学习西方文化。由于民族危机严重，自1888年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改革。1890—1893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作准备。1895年5月，发起“公车上书”，同年中进士，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成为维新派的领袖。

②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89页。

③ 韩文举（生卒年不详），字树园，广东番禺人。迭任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神户《东亚报》、横滨《清议报》、横滨《新民丛报》各报主笔，自号扈虱谈虎客，鼓吹民族主义暴力。民国后，隐居乡井，以教书自给。

④ 欧榘甲（1869—1912），字云樵，广东惠阳人。青年时代与会党关系密切，曾在《清议报》痛论汤武革命，被康斥为大逆不道，勒令赴美洪门致公堂创设《大同日报》，后来又攻击孙中山，受到立宪、革命两派之批评。遂匿居不出，郁郁而终。

⑤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见《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骤于大剧场”^①。这年秋天，梁启超至香港，“尝访陈少白^②，殷殷谈两党合作事”，并推陈与徐勤^③起草联合章程。但徐勤与麦孟华^④坚决反对，他们分别“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说梁启超已渐入孙中山之“圈套”，非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初得十三人的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稍延^⑤。至此，孙、梁合作之局流产。

在此后的三四年间，梁启超虽然被康有为强迫从事保皇会事宜，但他却违背康有为的旨意，发表许多文章，如1900年的《立宪法议》、《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的《卢梭学案》，1902年的《新民说》、《释革》等，大力宣扬暴力革命和民权学说。他说，处今日腐败之中国，若行渐进的部分的枝枝节节的改革，“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不会求得真正的进步，“我国民将被天然淘汰之祸”，“万劫不复耳”。他在指出“改革论”不可行的同时，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

① 梁启超：《破坏主义》，见《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5页。

② 陈少白（1869—1934），号夔石，广东新会人。1895年与孙中山、杨衢云等成立香港兴中会，此后一直紧跟孙中山革命，1899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又联络会党，接济惠州三洲田起义，又组织“振天声剧社”，提倡民族主义。1905年香港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1911年广东光复后，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组织粤航公司，谋收回航权。晚年全力于其家乡建设。著有由陈少白口述、许师慎记录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及《兴中会革命史别录》等书。

③ 徐勤（生卒年不详），字君勉，广东三水人。康有为弟子，1896年为广州万木草堂学长，曾任澳门《知新报》撰述，为《时务报》撰文，1898年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校长。戊戌政变后，他对孙、梁合作，阳为赞成，阴为反对。嗣后追随康有为。1905年，在香港办《商报》，次年在新加坡办《南洋总汇报》，活动于南洋、美、墨等地十余年。

④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举人，康有为门生，与梁启超齐名。1895年春与梁启超同寓北京，参与“公车上书”。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不缠足会于上海，并为《时务报》撰文，主张“尊君权抑民权”。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陕、浙等省举人，反对租让旅顺、大连给俄国。旋又列名保国会，戊戌政变后，在日本帮助梁启超办《清议报》。1907年政闻社成立时，被推为常务员，以后紧随梁启超。1915年初病逝。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